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



东方的觉醒

——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

章开沅主编 唐文权著

湖南出版社

东 方 的 觉 醒
——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

章开沅主编 唐文权著

责任编辑：李沛诚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72000 印数：1—1150

ISBN7—5438—0016—0

K·8 定价：4.05元

总 序

章 开 沅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学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的老前辈，司马迁早就说过：史学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学科分工而言，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但是更应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如果作更为超越的宏观考察，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子的现代化？当前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且对当前的实践及时作理论性的总结与探索，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确切而有益的结论。历史学不能代替其他学科，更无法涵盖一切，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需要，

因此应该而且能够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我们把这套丛书定名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目的正在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外现代化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力求在辨别各国近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寻求某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作为现今“四化”建设的借鉴。其所以取名为“近代化”而不是“现代化”，乃是由于这套丛书作者的研究范围，大多侧重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多写一点自己熟悉的东西，少写或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这倒不一定是取巧或偷懒，或许正是一种具有某些自知之明的实事求是。

从历史本身来说，前后连续的过程是很难一刀两断的。特别是所谓近代化与现代化，由于它们都承担了工业化、民主化这样一些基本任务，因而更难作严格的断限。概略地说，作为这套丛书研究对象的近代化，大体相当于罗荣渠教授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所说的“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联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特征。与晚近现代化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把这套丛书，作为承担整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起点与基础的理由之一。

正如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难以一刀两断一样，历史与

现实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在研究中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必然要牵扯到国内外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因为，社会结构尽管在其早期显得相对简单，但它的许多机制与社会效应，却往往是在发育成熟以后，才能作出更为完整、深刻、清晰的判断。历史考察的时段，其所以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有些作者必然要对若干重大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与评论；其中有的是外国作者，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其见解难免有与我国习见的观念相距甚远乃至正好相反之处。我认为，学术上的见解分歧是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的相互辩证驳难，乃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必经之途。对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样的大课题，更应该超越于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的局限，以人类文化的总体观念来综览全局。希望读者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并且欢迎大家给以评论以至辩驳。当然，有的外国学者在亲自校阅译文的过程中，由于考虑到中外学者在使用某些名词概念时理解差异甚大，为避免引起某些不必要的误解，已对译文若干段落略加更动。我们尊重原作者的意愿，并认为有必要在他们的著作中译本行将出版之际作适当的说明。

在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又工程浩繁的科研项目。而说到底，难就难在知己知彼。

很难设想，如果对己对彼都知之甚少或知之甚浅，还能作出任何较有意义的比较。即令有的作者运用了较为优越的比较方法，而如果他对中外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缺乏

有关中外学术文化的起码素养，那也很难获致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有必要借鉴晚清思想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因为它也是以中外比较，特别是中外文化比较，作为思想与理论基础的。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在《晚清学术概论》一书中曾经作过坦率的检讨：“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梁氏强调了语言文字的阻隔，但问题又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的阻隔。因为，语言文字固然是通向西方文化的桥梁，但如果仅仅满足于西方语言文字的掌握，而不去认真研读西方的重要典籍文献，不去深入地了解西方的社会结构与风土人情，则仍然说不上是通晓了西方的学术文化，当然也说不上是通晓了西方的历史与现状。正如过去一般八股士人，尽管文笔娴熟，制艺成篇，但也不等于是通晓了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现状一样。

梁启超具有相当丰富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素养，又曾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并曾周游欧美诸国，对日本与欧美的学术、文化、历史、现状都曾下过很大功夫去了解，尽管不免有生吞活剥、饥不择食之讥，但其治学之勤与涉猎之广，至今仍然使我们为之惊叹心折。以他这样的条件，尚且以“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自责，我们现在进行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岂可不在知己知彼方面更为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

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乃至相邻各省之间，都有很大差异。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族文化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长期兼收并蓄，吸收涵蕴，其中已包含许多国内兄弟民族文化以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迄至今日，各少数民族虽然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文化影响，但同时又保持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点。

中国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沧桑，活力犹存，其漫长的发展诸阶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对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渗透，形成儒学本身的演化流变。及至鸦片战争以后，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五四运动以前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五四运动以后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入，这些外来思想都曾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摄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与外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获致某些切合实际的有益结论。如果不是从详尽了解历史与现状的实际出发，而是匆匆忙忙急于作简单的定性、立论、构架，则很难避免主观武断的毛病，其“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可能更甚于晚清思想界诸先驱。

研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客观，需要超脱，需要尽量排除某些不必要的政治的、感情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干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之所以一时看不清楚或产生错觉，并不一定都是由于立场、观点的错误，倒是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与视角的差错。因此，我们既着眼中国，又要走出中国；既立足现实，又要超越现实。这就需要具备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见识，力求从世界全局来观察中国，而不仅仅是从中国来环顾四周的世界。我们之所以需要做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原因即在于此。

钟叔河先生办了一件大好事，他编辑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形象如何在中国人的眼光中逐渐发生变化，而这些世界形象的变化又如何逐渐影响着中国的变化。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还缺少一项与此相对应的大工程。为此，应该编辑一套《走向中国丛书》，通过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的旅行者、学者、教士、商人以至外交官的日记、游记、通信、回忆录等等文献资料，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形象如何在外国人的眼光中逐渐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把上述已经做的和尚未做的两项大工程结合起来，一定可以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世界眼光与世界见识。

今年夏初，我利用频繁的外事活动的间隙，在美国新港（New Haven）小住三周，每天到耶鲁大学宗教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的善本室（Special Collects）查阅有关档案文献。在我过去的老师贝德士（Dr. Minnet Searl Bates）的百余盒档案中，发现有一部他晚年

尚未完成的大书手稿，题目是《新教徒在华五十年》(Protestant Effort In China 1900—1950)，内容极为丰富有趣。我循着他所引用的众多文献绵索，又发现这个图书馆收藏着卷帙浩繁的到过中国的众多外国传教士的档案、手稿与著作，相当详细而又如实地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见闻与感想。其中当然夹杂了不少宗教色彩、种族歧视与政治偏见，但也保留着大量比较客观、平实的原始记录。仿佛是一面面镜子，从不同侧面、角度、层次，反映出中国的形形色色，难免有所扭曲，但从总体上来说，毕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因为这些文献正好弥补了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即从外在世界来观察中国。

以上主要说的知己难，下面再讲一点知彼之不易。

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全体未尝参加”晚清思想启蒙运动，这段话显然有一个漏洞，因为作为运动领袖之一的严复就是西洋留学生，尽管是官派的而且学的是海军。但即令通晓西学之深且富如严复，他最熟悉的也无非是英国的学术、文化、历史与现状，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对于作为西方文化主要代表的西欧（包括英、法、德）了解较多。至于与法国有同等影响的美国，严复就不大熟悉。真正说得上“美国通”的是容闳，但可惜他虽然写了一本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但并未着力于美国学术文化的介绍。所以，梁启超的话从总体上看评判也没有错，“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所大谈特谈的“西洋思想”，主要还是靠“东洋留学生”从日本人那里零零星星贩来的“二手货”。

所谓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内容之广泛与内部差异

之悬殊，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国家，而西方则包括几十个国家，甚至包括好几个洲。各洲之间和各国之间固然差别很大，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我们研究鸦片战争史，常说西方进步、开放而中国落后、封闭，殊不知当时西方也有落后、封闭的国家和地区。正如恩格斯所曾指出的，直到1847年，“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方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即旧瑞士。”^①特别是“旧瑞士”，“它简直象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我举这样的例子，决非是想在鸡蛋里挑剔骨头，而无非是想说明，即使是同属于所谓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欧洲众多国家，其历史进程也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各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便是相对的，它蕴含于许多国家的千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现时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指美国文明或美国式的文明。美国虽然得天独厚，经济发展水平极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的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新大陆的支脉，也是各国移民带来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真正称得上是属于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文化，由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猖獗，已经几乎被赶尽杀绝，只能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或旅游景

^① 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85页。

点的装饰。美国东北地区，特别是所谓新英格兰诸州，受英国文化影响较深，而西部地区则受西班牙文化影响较多。至于北方与南方之间差异之明显，则即使是初到美国者，一眼也可以看出。但是这些话早已成为陈词滥调，因为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按照《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判断，北部的衰落和西南部的兴盛，即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之势已经无可逆转。尽管新英格兰诸州某些古老家族仍然那么矜持傲慢，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正在逐渐取代他们传统的主导地位。所以难怪我的学长TK（唐德刚）要批评他的老师胡适，指出胡氏所终身倾慕的新英格兰和纽约郊区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阶级生活方式不能代表美国文明的全局。“至于WASP幕后还有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们所能透彻了解的了。”^① TK是历史学家而又旅居美国逾四十年，“隔靴搔痒”之讥当非无的放矢。

作为亚洲国家，西化最早而又收效最大的当数日本。但日本向西方学习并走向现代化，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所谓“脱亚论”（即主张脱离亚洲的陈旧传统）曾经一度颇具声势，但“和魂洋才”（相当于我国的“中体西用”）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并未完全脱离东方儒学文化圈。当然，所谓“和魂”并非单纯是已经日本化的儒学，还包括其本土的神道教之类。在日本，

① 参见唐德刚编校译注，《胡适的自传》第三章注释（4）、（5）。

真正堪称大幅度的西化，是在战败并被盟军（主要是美军）占领以后，与土地制度改革及民主观念冲击相伴随，日本社会受到美国文化的极大影响。尽管有人将日本列入“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实际情况却是离开传统儒学文化愈来愈远，特别是青年一代。当然，这并不排除日本仍然保留着不少旧的传统的东西，乃至亚洲人民所最为痛恨的军国主义的残余。近些年在现代化问题研讨中出现一种倾向，即单纯以经济发展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各种文化的价值，而且往往是只注意眼前却不顾及长远，这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不能只注意经济发展水平而忽视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永远那么先进，社会结构就那么十分合理。如过去的德国和今天的日本，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傲视全球并被一些人视为西天乐土，然而曾几何时它也面临着大英帝国趋于颓败的相似境遇。对于美国，我们既不应因为其昔日的兴盛而褒之过高，又不能因为其现今的衰降而贬之过低。对于日本的兴衰浮沉，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当然，日本人并非都“沉醉于日本自开天辟地就是雄踞世界的一流国家这一幻想之中”，其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者大有人在。在国内争议甚多的《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作者高桥敷，就曾经忧心忡忡地提醒国人，“请看当今日本人的现状——他们满足于名次排列和产品的数量，关于人的意识，仍停留在二千年前的石器时代，他们狂妄自大，以世界第一等国民自居。

一 被踉跄推入近代的门槛

——背景：西力膨胀与东方衰微

世界史研究者通常把十六和十七世纪初期称之为中古时代的后期，而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之为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在此时期，东西方文明世界先后转入封建主义衰亡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渡阶段。因种种因缘条件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自身转变者，便成为及时跨入近代门槛的幸运儿，未能着此先鞭者，便继续因循中世纪的重负留在门外踟蹰徘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在落后被动地位。纵观当时作为世界历史主要舞台的欧、亚两洲，英国和中国、印度恰好分隶这两种不同情况。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初期的中国和印度，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却又停滞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制度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渐滋暗生却又难以顺利成长。与此同时的英吉利海峡两岸，却是另一番情景。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扩大了社会劳动分工，刺激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国内外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对商品需求的增长，加速了封建行会生产的衰落和封建庄园的解体，也加速了手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现。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手

工业者变成了企业资本家，多数则趋于贫困，沦为受剥削的雇佣工人。一部分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雇佣少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于是出现了小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西欧的土地上，就这样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的绿洲。

要扩大绿洲，就需要资本的灌溉。于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便成为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当务之急。原始积累的方式多种多样，除象英国“圈地运动”通过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以达到之外，另一主要方式是掠夺殖民地。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美洲和非洲人民所进行的空前规模的洗劫，为本国积聚了巨量资本。这种使用暴力和犯罪方法肆意剥夺国内外劳动者的做法，经典作家曾揭露它“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欧洲率先进入近代社会是以牺牲亚、美、非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中国和印度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创痛，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当我们在观照一个多世纪来中印两国争取本民族的政治独立之前，不能不对此先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东方的富庶和新航路的开辟

自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广泛流传之后，书中所描绘的东方的财富，不断激起许多商人、航海家和封建主的贪欲。获取东方国家神话般的财宝，就成为这些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确实，长期封建社会经济的积累使中、印两国积聚了丰厚的财富。中国物产丰饶早就远播海外，而印度的富庶同样引人注目。

南亚次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横亘在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一方面阻挡了冬季由亚洲大陆吹来的寒风，使印度免遭寒流的侵袭，另一方面又阻挡了夏季由印度洋上吹来的季候风，保证了印度中部恒河平原和喜马拉雅山南坡得到充沛的雨水。大小数百条河流从山地奔腾而下，汇成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马河三条大河，构成中部印度一望无际的肥沃的恒河平原，成为古代印度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印度南部是宽广的德干高原，呈一三角形大半岛，突出在印度洋及其支海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之间，成为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在印度肥沃的土地上，平坦的耕地和繁茂的森林，盛产大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黄麻、茶叶等经济作物。印度还有着丰富的矿藏，铁、煤、金、银、锰、铬的储藏量都排列在世界前位。总之，宜人的气候，复杂的地形，丰富的物产，漫长的海岸线，从地理环境面言，印度真是天府之国。

印度的富饶，自发现以来就不断地被西方旅行者所报道。

1660年左右曾两度游历孟加拉的法国旅行家培尼埃认为，“我两次游历孟加拉所得的见闻，使我相信它比埃及更富。它输出大量的棉花和丝、米、糖、牛油。它出产足够它消费的小麦、蔬菜、五谷、鸡、鸭、鹅。它有极多的猪群和羊群。它有极丰富的各种各样的鱼类。从拉祁马哈尔一直到海，有无数条通恒河的运河，都是在从前为了航行与灌溉而以大量的劳力挖掘的。”^①这种普遍繁荣的报道，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仍

^① 转引自杜德《今日印度》上册，第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版。

不间断。十七世纪的旅行者塔浮尼亚写道：“甚至在最小的乡村中，米、面粉、牛油、牛奶、豆类和其他蔬菜、糖和别的蜜钱，干的湿的，都能丰富地获得。”^①直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出任孟加拉英国总督的克莱武还夸张地对孟加拉旧省会摩歇达巴德作如此描写：“这个城象伦敦一样宽大，人烟稠密，富庶。不同之处是在于，前者有些个别的富户，他们拥有的财产，比后者的富户多得多。”^②

为了获得比较充裕的东方商品，也为了满足对东方贵重金属的渴求，经济日益发展的西欧各国，迫切需要叩开传闻中遍地财宝的中国和印度的大门。但是，旧有的东西方几条商路却因各种原因而受阻隔。十五世纪土耳其的扩张，把地中海通往亚洲的商路堵塞；金帐汗国的崩溃，又使从黑海北岸横穿亚洲大陆直达中国的商路受到影响；阿拉伯人的垄断复又把经过埃及和红海或经过两河流域到达波斯湾的商路截断。这样，就迫使西欧各国另行设法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最先发现通往印度新航路的是葡萄牙人达·伽马。他率领一支包括四艘船、一百余水手的远航队经由非洲，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有名的港口古里。返航时运回了大量香料、丝绸、宝石、象牙等，获利达航费的六十倍。首航成功激起了千帆竞发，两年后，他的同胞卡伯拉尔再次东航印度成功。1505年，葡萄牙国王正式任命亚尔米达为第一任“东方总督”，俨然以东方殖民统治者自居。1510年，被任命为葡萄牙印度事

① 塔浮尼亚，《印度旅行记》第1卷第238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25年。

② 转引自杜德，《今日印度》上册第22页。

务总督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凯克占领了富庶的印度港口果阿，控制一支印度西海岸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他死后，他的继任者除了在印度沿海建立许多重要的殖民地，如第乌、达曼、萨尔塞特、巴塞因、乔尔和孟买，马德拉斯附近的圣·托梅和孟加拉的胡格利等地，又侵占了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枢纽的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葡萄牙人凭借军事实力，进行掠夺和不等价交换，垄断印度和欧洲的贸易。1515到1517年，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佐治·达尔伯克喀多次派人来华，表明葡萄牙殖民者由印度继续东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在中国，他们先后强占广东的电门、澳门，浙江宁波的双屿，福建泉州的浯屿、漳州的月港、诏安的走马溪等地。十六世纪初西力由印及华的东进路线，恰似为十九世纪初的第二轮活动作了先导。只是由于东西方力量尚非悬殊，头一回的东进受到有力的阻遏，取得的进展并不大。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初明朝政府成功地将盘踞在广东电门的殖民者驱走，四十年代末又将闽、浙的据点扫除。在印度，1632年莫卧儿王朝的沙·贾汉将盘踞胡格利的殖民者驱走。

同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印度探航的路线不一样，在十五世纪末得到西班牙国王资助的哥伦布却从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企图以此到达盛产香料和宝石的东方。哥伦布西航发现的是美洲新大陆，但他却认为所到之处就是印度，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以至这个错误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同样得到西班牙国王资助的麦哲伦，怀抱同哥伦布同样的目的，在1519年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后，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南美南端海峡进入后来被称之为太平洋的洋面。这支舰队于1521年11月到达